

临邑党史资料

第十集



中共临邑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日

李平、王良民同志谈县区
组织沿革和临北工委问题

目

录

(据谈话录音整理)

- 李平、王良民同志谈县区组织沿革和临北工委问题.....(1)
- 陈文轩、李新华共忆有关土改和支前情况.....(10)
- 回忆我的母校和我的老师及同学.....孙法善(17)
- 回忆我在临邑五区工作的几个片断.....刘润吾(26)
- 我参加革命的前前后后.....郝汇川(33)
- 忆学兵连始末.....齐健民(59)

前的秘书干事是潘先等同志。他向我交待的工作。当时的县委书记是李授同志(番号是704)。李授当时是地委的民运部长兼临邑的县委书记。其他的委员有刘雨千、张静波、夏德盛。其他的我就记不清了。我印象李授是在一九四一年的冬季调走的(大概是十二月份)。这个时候马村同志来接任县委书记。这时县委其他成员没有变动。关于县委的情况我了解的不多。记得一九四一年七八月份。是专署的秘书主任王其元同志代理县长。他在县府呆了很短的时间。徐尚武同志调回来就继续担任县长。县府秘书主任是尹一农同志。行政科长(民政科长)李耀民。其他的科我记不清了。一九四一年底徐尚武同志开始做二分区司令部的的工作。县长由王其元同志接任。

(二)

王良民 各区的情况。关于三区的情况余谈三区。去三区之前

也就是一九四一年六、七月份我在学习班学习，和我一块学习的有孙玉茂、陈树义、李平、王良民同志谈县区

组织沿革和临北工委问题
(据谈话录音整理)

一九八四年十月四日上午于泰安市第二招待所

(一)

王良民 从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到四三年年初这一段，临邑县委和三区、二区、五区党组织及临北的情况经过两天来的回忆谈一下。我记得一九四一年的下半年，可能是七月份，我从地委和临邑县委合办的训练班学习完后，被分配到临邑县委任秘书干事的。在我之前的秘书干事是潘先锋同志，他向我交待的工作。当时的县委书记是李援同志（番号是704）。李援当时是地委的民运部长兼临邑的县委书记。其他的委员有刘刚平、张静波、夏彰鉴，其他的我就想不清了。我印象李援是在一九四一年的冬季调走的（大概是十二月份）。这个时候马冲同志来接任县委书记，这时县委其他成员没有变动。关于县政府的情况我了解的不多，记得一九四一年七八月份，是专署的秘书主任王亦山同志代理县长，他在县府呆了很短的时间。徐尚武同志养伤回来就继续担任县长，县府秘书主任是尹一农同志，行政科长（民政科长）牟康民。其他的科我记不清了。一九四一年底徐尚武同志开始做二分区司令员的工作，县长由王其元同志接任。

(二)

王良民 各区的情况。关于各区的情况先谈三区，去三区之前，

也就是一九四一年六 七月份我在学习班学习，和我一块学习的有孙玉茂、陈树义，其他人记不清了。领导学习的是李吉祥同志。地委和县委的李平、李援同志给我们讲过课。学习约二十来天。后在七、八月份就到临邑县委做秘书干事，时间很短就调到三区区委做宣传工作（区委宣传委员）。区委书记不是夏彰鉴就是张静波兼着，详细情况忘记了，组织委员是李玉林。我主要是在台子刘家、大庄、小庄、穆家、街西王家这一带做地下党的工作。

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底，大概十二月份，县委书记马冲给我去了封信，内容是：“现在临邑分家，临商公路以北属临北管，县委决定把你调回公路以南。”我晚上接到信后，就马上到临商公路以南的二区去了（也就是孟寺这一块）。这时正组织二区，时间好象是一九四一年的年底或四二年的年初。区委当时有张静波、李玉林我们三人。时间不长李玉林、张静波就调走了，一九四二年春我是区委书记。区委有刘永山（刘志民的哥哥），还有张宝生，还有一个刚脱产的刘跃亭。当时的区长是李耕耘，活动地区是蒋家、胡六庄、油房这一带。

到一九四二年的夏季，我就调到临邑五区（玉皇庙一带）任区委书记了。我去之前，好象是李吉祥兼着区委书记，不长时间他就不见了，我去之后，区委有我，其他人想不起来了，我到五区还没和区队的党员接上头。区长王治业就叛变了，以后就是许吉斋，许也是小土匪，是李光明那里分化出来的。他当区长时我就走了，后听说他也叛变了。当时区委活动在鞋履坞、小温家桥、岳店、宁家、被马店、安家、塔坡、纪家这一带。到了一九四二年的上半年，这边环境恶化了，枣园安了敌伪据点，我们经常爬鸿沟越岗楼，活动十分困难。

记得到了一九四二年的十来月份，地委在平原办学习班，当时负

贵办学习班的有地委组织部长李平，宣传部长关锋，还有张梦生同志。这时调我学习了两个月，后就到地委宣传部担任印刷科长，主要任务是印整党整风的二十四号文件。夜间工作，白天把印刷机藏起来。时间大约二、三个月，大概到了一九四二年底，我又到地委组织部，还有一个科长叫徐新光（也叫张肥），我们俩个在一起，组织部长李平大部分时间住济阳。到一九四三年的春天（大概是三月份，当时组织部活动在陵县）。这时大哥郝炬和我讲，“二哥来信调你到济阳去。”这样我带着郝炬同志写的介绍信，由交通站护送，穿过敌占区到了济阳的迴河。这里是地委组织的工作组，由部队的同志和我们一起开展建党活动。我记得一去接任时是齐龙潭同志交待给我的工作。还有王玉光同志，他们都是工作组的。在这一地区只发展了一批党员，当时支部建的不多。临邑五区一九四二年的年底就划为济阳北二区，济阳的北二区除去临邑一部分还有商河的一部分。我记得当时济阳北二区（即临邑五区）的政权组织，开始李耕耘（一九四一年底或一九四二年初）是区长，李耕耘调走后，马天成是区长，我一九四二年夏季到五区是王治业的区长，以后不久他就叛变了，李吉祥被搞，以后争取了一个从敌人那边反正出来的许吉斋，他当时是在临邑五区当区长。这是一九四二年的下半年，从一九四一年的下半年一直到一九四三年的春天，我所了解的临邑三区、二区、五区，县委和县府的基本情况就是这些，有些记不清楚了，特别是时间问题不很准确。

（三）

李平：以王良民同志回忆为基础我来补充一下。从一九四一年麦收以前敌人扫荡开始，徐尚武同志负伤，刘江明牺牲，王亦山来代理

临邑县长 夏彰鉴暂时由组织部长提为副书记照顾县委的工作。我照顾上边并和王亦山配合。这时的县委组织变动很大。李援同志（704）作为地委的民运部长兼任临邑县委书记。因为我看到过他和徐尚武的警卫员王志顺谈话，教育他，批评他脱离首长和丢枪之事。这样就联系到徐尚武同志养伤回来又恢复县长工作。这也是一九四一年秋。王良民同志出来就在这个时候。而且已经出来了，或者说已经受训学习的时候。你出来的时候已是大扫荡过去了。正是李援来到，徐尚武养伤出院的时间。这期间大约有三个月。此期间县委成员有李援、刘刚平、彰鉴、张静波。张静波提为宣传部副部长。王良民同志任县委秘书干事。不长时间就转入三区任区委宣传委员。这个区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静波兼着区委书记。彰鉴一度是县委组织部长又是县委副书记。这时刘刚平就到济阳任工委书记了。当时的三区区委书记是张静波、李玉林、王良民。还有李修，这是比较准确的。一九四一年秋冬就是这么个情况。县政府的情况是王亦山代理县长。尹一农是秘书主任。牟康民是财政科长。县委书记李援是一九四一年底调三地委。马冲来接任的。一九四二年春和夏县委和政府是这么个情况。同时还可以说，王良民在三区时，夏彰鉴是副书记兼组织部长。刘刚平在公路以南负责济阳工委的工作，公路以北划归临北把王良民调公路以南。这时临邑县委就都移到公路南了，因此刘刚平也继续在县委。这时的临邑县委、县政府大部分跨济阳，向济阳开辟了。因此刘刚平的济阳工委不能单独存在，和临邑县委有密切的联系。一九四二年一月至七月是如此。王良民一九四二年上半年在二区。二区区委书记有李玉林、王良民、张静波。区里只要有张静波，无疑就是他的区委书记。如果张静波走了，你王良民就是区委书记。彰鉴是在这年调德县的。王良民到二区也

是李耕耘时代。那么李耕耘以后调走就是马天成的区长（民政助理）。实际情况是张静波干了一段走了，就换了王良民。而后王良民调到五区。时间是一九四二年的下半年。（王良民插话：我开始去的时候见到过李吉祥，说明那时候李吉祥还没被捕。）你刚去时也不是书记，是李吉祥的书记。李吉祥很快被捕，以后就是良民的区委书记。这时也就是王治业时代。王治业叛变时良民可能在五区。王治业叛变后良民继续在五区。然后区里就换了许吉斋，许吉斋大扫荡后很快就叛变了，也就是一九四三年的二三月份。这个阶段临邑党政组织系统的变化，王良民同志的回忆可以说是准确的。这个时候还没产生临北，指徐振国时代。到一九四二年的十来月份良民被调到地委受训，受完训就被留在地委宣传部当印刷科长，印整风学习文件，大约二、三个月的时间，就到年底了。

（王良民插话：许吉斋叛变时我不在五区。许吉斋未叛变前我们在一个区配合过。他是一九四三年的年初叛变的。）

李平：我仔细回忆了一下。王治业当时是徐尚武直接掌握的干部，是个富农。开始担任区长时还不愿意，有点小胆。我和他谈过话，对他进行过教育。结果他后来叛变了。当时大家对徐尚武同志还有点看法，认为光凭个人感情来用干部不行，必须加强政治思想教育。总结当时的教训，是政治思想教育差。王治业叛变后接着来了个许吉斋，许来是孙子权专员同意的，知道他曾干过土匪，好喝酒，又是个流氓，但是他和李光明这个大汉奸头对立。大概就是利用这一点争取了他，担任了我们的区长。他叛变是良民已经走了。良民同志在地委工作时，临邑县委还是那个班子。许吉斋叛变时，李吉祥已逃出了敌人的虎口。

和我们取得了联系，我们对他考验了一个阶段，安排了他的工作。到了一九四三年的春天良民被我从地委要来济阳，当时我是这样想的，良民家乡在这个地方，土生土长，人熟地熟，调他来开辟这个地方有利，所以把王良民和李吉祥安排在二、五区为正副书记（李是书记，王是副书记），以后就分开了。

【王良民插话：还有一段二、三区我和纪玉文同志先后任书记和副书记（我的书记，纪是副书记），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又分开，我就专管迴河区了。】

李平：我印象很清楚，济阳二区、五区、三区，是良民和李吉祥开辟的。分开以后李吉祥在五区，王良民在二区。到了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和一九四四年就发动起来了。王良民和李吉祥合组二、三、五区时，县长是王其元，这时把王良民和李耕耘活动的临邑二区划为济阳北二区，因为济阳南边有个二区，济阳县跨临邑二区（就是孟寺这一带），我记得这是马冲时代，即一九四三年春的情况。

【王良民插话：我记得马冲同志在四区还活动过。】

李平：这就是说济阳县一建立，临邑县政府还存在一个短短的时期，最后建了济阳县就把他们调走了。

【王良民插话：我印象一九四三年的年初，马冲任过济阳县副书记。】

李平：那时已经一元化领导了，马冲一度当过县委副书记，大扫荡过后齐河的王仲民找不到了，这里缺个人，就调王希平来任齐河县委书记，王希平调来，马冲调走到陵县担任副书记，就把张振国调来临邑任副书记，这里的组织部长是李吉祥，王良民是副部长兼区委书记，这就是一九四三年的时候，这就是你所说的马冲曾一度为副书记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郝炬他这个时候由地委书记变为副书记，曾旭清是书记。这是大扫荡前会议上宣布的，实际一元化在大扫荡以前就传达了。马冲一度担任副书记，不是马上就走。我到齐河代理书记也不是马上就去的。这里证明一个事，就是有王仲民，也有王其元，从齐济合并到分家，那么就是看看王其元走了又回来了吗？据王其元自己谈，他是一九四三年七月离开临邑到地委任秘书主任，到一九四四年的一月他到济阳任县长，这就说明他调走时是齐河济阳合并，济阳县跨北二区时，就出现临北了。

(四)

王良民：一九四一年下半年，我在以大庄、小庄为中心的台子刘家、胡集这一带做地下党的工作。关于临北工委的建立我记得是一九四一年底或者是一九四二年初，很可能是一九四二年春天。为什么说可能是这个时间呢？因为当时的县委书记是马冲，马冲经常活动在临邑二区，这时马冲同志给我写了个信，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内容，意思就是临邑北部再建立个临北办事处，调我到临商公路南，我这个印象比较深。究竟是我调走时成立的临北呢，还是以后建立的呢，我就不清楚了。所以，对临北工委人员的组成情况也说不清楚，因为我是在边区里工作。再一个就是建立临北工委的背景情况，主要是因为环境非常恶化。

在一九四〇年我们临邑是一块很好的小根据地，那时候县长是徐尚武，县委书记是刘江明，之后就是李援了，那时候我们县委、县政府、区都比较健全，当时工作也很活跃。到一九四一年形势开始变化了，一个是台子刘战斗徐尚武挂花，刘江明牺牲，这时的环境开始恶化，敌人到处建据点，当时很大的一股敌人就是曹五旅，那时他已投

降日本鬼子了，这样我们就很难活动了。当时我在北边三区活动，其他人已调走了，活动非常困难。我记得在小穆家我发展了个党员，我再去他的父亲就不让我在那里住了。我只好住在他外面的一个柴禾园子里的草垛里。这就是说环境恶化了，南北已经不好活动了，敌人设了些封锁沟和据点。加之南边济阳是新开辟的。总之，根据这种情况，领导才决定公路以北再建立个临北工交办事处。

王良民：我再谈一下徐尚武领着打垛石桥的情况。打垛石桥是一个部队打的，有临邑县大队，那个部队记不清了。在一九四一年阴历的八月份，谷子快熟了，县长徐尚武决定打垛石桥。因为当时我们正准备开辟济阳，垛石桥是一个比较顽固的据点，又是我们通往济阳县境内的一个障碍，这样必须先把垛石桥敌伪据点拿下来。攻打之前是徐尚武动员的，我记得大体内容是这样的：我们一定拿下这个据点，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，鼓鼓劲。我相信咱们县大队抗日战士都是英雄，我相信咱们一定会胜利！垛石桥据点内有我们的地下人员李克己作内应，向导有我（因为我是那个村的人）和陈树义同志（他是铁匠家的），他原是伪组织选武班的公务员，是我发展的地下党员，他是做为我军从据点西边攻打的向导。因为据点就在徒骇河边上，据点西头靠徒骇河有个桥。陈树义引导我军从西边桥的方向攻打，他们主要是对付日本鬼子和一小部分伪军。我领着一个连的兵力从东边攻打。东边的伪军被我们一打就集中到^{西边}有日本鬼子的地方去了。这样以来西面敌人的力量就强了。当时他们据点修的有掩体，是比较坚固的，对我们很不利。我们的一个队长（忘记名子了）是一个红军干部，在战斗中牺牲了，这个同志一牺牲，我们的进攻就停止了。不然这个据点是能打下来的。因为这时鬼子已经是很狼狈了，我们的同志一牺牲，再说时间

不能拖得太长。因为垛石桥据点离济阳城只有三十华里，敌人支援很快，所以我们就没再继续坚持。拣了点枪支和其他东西就回来了。战斗收获不算大。咱们打了两个来小时，战斗基本结束后，我就去接我党地下人员李兴民同志。我们原订的暗号是敲敲墙他就出来，到徒骇河北岸集合。这次战斗是我在县委任秘书干事时期，也就是徐尚武伤愈回来打的。当时已公布他是二分区司令员了，但还兼临邑县长。正是建立分区部队组织班子阶段。到了年底班子队伍建立起来了，这时县长就由王其元同志接任了。

这是打垛石桥的情况。我们虽然没拿下来，但是给鬼子一个很大的打击。据点没拿下来的原因，除了我们牺牲了一个同志以外，主要是对敌人据点侦察了解不够，对他们内部的情况不够熟。当时里边实际只有十五、六个鬼子，另外就是些伪军。武器好，有碉堡。咱们当时没有炸药，武器装备不如人家，所以这次战斗收获不大。关于攻打据点的部队我搞不清楚，只记得不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。有一个人叫陈树生（现在泰安已瘫痪了），当时是一个班长。这次是第二次打垛石桥。第一次是一九四〇年，第三次是一九四四年春天。朱宝成领着打的，这次成功了。

四月份被分到齐临四区工作。我原名叫李清香，因工作需要，后随母姓改成王新华。一直到一九五六年，经上海房管局党委批准，恢复了原姓改成李新华了。

我在临邑一共五年。从一九四四年五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，在四区任农会干事，以后是区交委员。这时的农会主任郑玉胜。一九四五年八月齐临就分开了。四区改称临邑县御社区。开始我还是区交委员，老陈是宣传委员。以后是

陈文轩 李新华共忆有关

临邑的土改和支前情况

(据本人谈话录音整理)

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

陈文轩：我和老李（李新华）同志从出来就在一块，真是老战友了。我们分手正是全国解放的前夕。那时李新华叫王新华，他随着大军南下到浙江。我就离开临邑狮社区到济阳县委宣传队。一九五二年又调我到华东党校学习，赶上三反运动就把我留下，运动结束就把我分配到上海了。老李一九五二年调上海华东纺织管理局，我们同在上海呆了一年，一九五三年我被调到北京来。一九六四年老李同志也调北京来。我们又在一起了。

我一九六二年参加广州交易会时因撞击致成脑振荡，自那记忆力不如以前了。老李的脑子比我好。叫老李同志先谈谈吧。

李新华：我是一九四四年三月参加工作，老陈同志是一九四四年四月（陈插话：我入党是四四年二月），当时齐临县有个知识分子训练班，学习了一个月。四月份被分到齐临四区工作。我原名叫李清香，因工作需要，后随母姓改成王新华。一直到一九五六年，经上海房管局党委批准，恢复了原姓改成李新华了。

我在临邑一共五年，从一九四四年五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。在四区任农会干事，以后是区委委员。这时的农会主任郑玉胜，一九四五年八月齐临就分开了。四区改称临邑县狮社区，开始我还是区委委员，这时老陈同志在那里。咱们都是区委委员，老陈是宣传委员。以后是

各教会主任（包括农青妇、儿童团）；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八年五月，这个四年半的时间我活动在两个区。从一九四八年六月我就到县委组织部待了半年，一九四九年三月南下了。

当时四区的负责人，区长吴化善，区委书记张建伟，农会主任郑玉胜，陈文轩是宣传干事。

后来狮社区的负责人，区长刘刚峰，现在济南，区委书记宋文清（病故）。

这两个区管辖的范围，我回忆一下，东到夏口，西到田口（四区时），北到马坡，南到周徐二庄（南靠齐河，东靠济阳）。我记得有将近四十个村，现在我只想起三十七个村，即：马坡、宁楼、宁寿、清凉店、牛角店、郭集、王圈子、王楼子、朱家楼、东西双庙、李家庙、于家庙、柴家庙、杨家庙、小洼、小吴家、小王家、小张家（火把张）、小宋家、小刘家、东北清凉店那块、有石广二庄（回民村），我在那里蹲点将近一年，周徐二庄、牛毛徐家、马成黄家、李佛头（我是这村的）、于辛庄、巩家（于新岭就在这个庄安据点）、杜家（于新岭从巩家以后搬到这村）、张巨家、郎家、宋王庄、赵家、夏口、周家道口、刘家屯子。

（陈文轩插话：王常家、马家道口、小老庄）

李新华：好了，共计四十个了。我经常活动在夏口到张巨家一带，口口很少去，主要是于家庙、杜家、张家、王家、宋家、宁寺、宁楼、王圈子，住的多的还是于家庙、杜家、宁寺、于辛庄、张王宋。当时区的干部都有分工，那时叫联防，没有乡，我是带几个联防的。

关于运粮、藏粮、反抢粮的斗争，时间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，周围还有一些伪据点，如巩家、杜家、宁寿、田口、兴隆，据点

里一些汉奸经常出来抢粮。那时我们也发动群众和敌人斗争。把粮食藏起来（有的群众把粮食埋起来）。公粮有区队想法保护。群众收庄稼时，由联防队保护。一方面帮助抢收，一方面防止敌人来抢。

（陈文轩插话：挖一些地坑，上边用木头盖起来，垛上些柴禾，也有放在地瓜窖里的，上面用地瓜秧子一盖，只要没有汉奸报信也很保险。）

关于反奸诉苦，减租减息，雇工增资问题，反奸诉苦的时间是一九四五年下半年七、八月份开始，那时我们叫“反奸清算”。主要打击对象是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，对那些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要发动群众对其说理斗争。

（陈文轩插话：叫他戴高帽子游街。）

当时按照政策规定：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经过斗争以后没收他的土地和财产。经过群众的评议，有农会负责分配。对一般的地主按照政府的规定减租减息，我记得当时是二五减租，对高利贷按照分半减息，主要是减轻佃雇农的负担。

开始是有重点的进行。先选几个试点，对雇农、佃农、贫农进行个别串连，个别发动，先把他们组织起来，组织农会，然后经过培养教育开诉苦会，对大家进行教育。这样对参加农会的雇贫农，经过阶级教育，开斗争会时以他们为骨干，参加诉苦，带头说理斗争。这是四五年，我记得一九四六年五月份，中央就发了一个土地问题的指示，就是把抗日战争时期对地主、富农减租减息的政策改变为没收他们的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政策。这样以来，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，政府有规定，中央有指示，就是对地主、富农的财产和土地没收后再分给雇贫农，比前一段工作好做了，群众很高兴，贫雇农参加农会的越来越

越多了。这个时候的工作就是首先把没收的土地和财产，满足雇、佃、贫农的要求。大概又到了一九四七年九月份，中央召开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，制定了土地法大纲，十七条，这时轰轰烈烈的土改就全面开展了。高涨时期是一九五〇年，一九五〇年中央又搞了一个土地改革法，中央规定很明确，我记得是依靠雇贫农，团结中农，孤立富农，这么个政策，整个土地改革是到一九五二年结束。

我记得狮社区在一九四六年完成土改，但是四六年搞了以后不彻底，当时大家有些顾虑，把分的东西又退回原主。因为这个时期斗争非常激烈，一些被扫地出门的地主分子跑掉了，他们弄了些枪组织起地主武装回来进行反攻倒算，我们称他“还乡团”，这时搞得很激烈，所以一九四六年搞的不彻底，一九四七年又复查，这时我也搞了几个村子的复查。

（陈文轩插话，老李搞复查立了功，县里发的有奖状。）

我在复查中立了三等功，受到县委和政府的表扬。当时的县长是王叔五，政治委员张风伍，各教会主任杨瑞林。

一九四六年四七年斗争比较激烈，我记得出现过好几起事件。一个是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区公所在宁寺受到地主武装还乡团破坏，区公所没有什么东西，房子受了些损失，把锅砸了，人安全的出来了。把在押的几个犯人抢走了。当时的区长是刘刚峰。

（陈文轩插话，小组子砸锅这次是老李同志亲自在场，他主持那个大会，当时我不在，正参加德平工作组，在刘道行这块总结工作，听说狮社区所叫敌人包围了，我们连夜去支援。我们住在吕家寨，听到枪响，叫上宋文清，找上民兵，就上小街子，火把张家。我们赶到宁寺，南边碰上刘长华他们了，小组子跑了。这是一九四六年冬，万

人大会。马坡那次是一九四七年夏天。过了几天我就回到狮社区）

为什么砸锅呢？主要是搞反奸诉苦，借着冬天农闲的时候，开万人大会，几十个村选代表，有农会主任，进行阶级教育。在于辛庄子连着开了三天会，为了解决吃饭问题，集中了几口锅做饭，结果到了开完会的最后一天晚上，人都走了，还乡团就来了，当时我主持会，没离开，带着两个班的民兵，那时叫联防队，张好亮和我在一起，刘长华是人武部主任，按枪来说，他的枪最好，我们当时都配有通讯员，也是警卫员，都有枪，但子弹很少，还乡团一来，刘长华带一班民兵枪比较好一点，还有手榴弹，一冲我们就出去了。

另外，还有周许二庄事件，也是还乡团干的，有好几个积极分子被挖掉了眼睛，从那以后群众更加气愤了（陈，低潮了）。一个是怕存有变天思想，不好发动，另外就是大家很气愤，积极想办法和还匪斗争。

还有一次是一九四七年夏天在马坡，区队，区干部都在，夜里也叫还乡团包围了，我们也冲出去了。

（陈文轩插话：是夏天刚睡了觉，小组子进了村，站岗的发现了，一打枪都起来了。我一看，敌人顺着墙跟上来，民兵仍了两个手榴弹，响了一个……）

我记得当时的大事件就这么几个。这些大事件的出现，一度影响了反奸诉苦，减租减息、土改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
（陈文轩插话：由于那时地主还乡团曾嚣张一时，所以贫下中农的情绪一度出现了低潮，因为一些坏人反动分子造谣，传播国民党要回来，威胁群众，加之还乡团回来这一反攻倒算，进行阶级报复，钟楼子村的村长叫还乡团用铡刀铡死了，这样以来对贫下中农的威胁就

大了。因此群众对应分得的土地、雇工该增加的工资、佃农该减的租借债户该减的息等都不敢要了。不过，广大雇贫农和下中农对政府颁布的减租减息、雇工增资和土地改革政策还是很拥护的。因此成立民兵武装，保卫自己的土地，保卫自己的家乡和生命财产，就成了我们当时的紧迫任务。我们区里重点抓地方武装建设，加强联防。县里也支持我们区里的武装斗争，帮助我们加强区队人员的补充，帮助补充枪支弹药。这样以来群众的情绪又高涨起来了，所以以后的支前参军工作就好开展了。）

关于支前情况，这个工作大概一九四七年、四八年就进行了，我亲自经历的是两次。一次是一九四七年的九月到一九四八年一月，五个月，那时我在狮社区工作，我区组织一百付担架，叫支前支队，我担任支队长。另一次是一九四八年五月至一九四八年十月，也是五个月的时间，一百五十付担架，当时叫支前大队，我是教导员，随军解放济南，火线抢救。当时我们担负着济南的南门，和部队的团指挥所在一起。当时支前是很危险的，特别是支援解放济南，承担火线抢救任务。部队攻城墙，担架也得跟上去，有伤员马上抢下来，当时国民党王耀五的飞机很厉害，耳朵用手捂住都震聋了，我的耳朵发炎，耳膜穿空，大概到一九四九年就听不见了，那时治疗也没有这个条件。

虽然当时有危险，群众也不怕。群众为什么有这个情绪呢？一方面大家翻身了，土改以后分了土地，生活有保障了，再一方面大家对国民党反动派很气愤，不仅要求解放济南，还要求打到南京去，解放全中国。所以当时群众情绪很高，派谁去，谁就去，支前队也很好带。

动员参军我记得有好几次，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七年这三年每年都有，有的是大批的，有的是个别的，有的是补充县队区队。因此